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

台湾简史

Taiwan Jianshi

张海鹏
陶文钊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

台湾简史

Taiwan Jianshi

张海鹏
陶文钊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台湾简史 / 张海鹏, 陶文钊主编.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80729-908-0

I. ①台… II. ①张… ②陶… III. ①台湾省—地方史 IV. ①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0310号

- 书 名 台湾简史
主 编 张海鹏 陶文钊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210037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3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908-0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85521756)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佳木

副主任委员：茅家琦 陈孔立 张海鹏

委员：（依姓氏笔画）

王建朗 邓孔昭 孙亚夫 朱佳木 许世铨

张海鹏 杨天石 杨匡汉 何仲山 汪朝光

陈孔立 陈祖武 茅家琦 郝时远 姜小青

陶文钊 徐博东

主 编：张海鹏

副 主 编：陶文钊 王建朗 汪朝光

执 行 编 辑：王 键 杜继东 陈晓清

总 序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仍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加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台湾历史研究、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认识百多年来台湾人民的苦难、奋斗和牺牲,对于理解台湾人民,进一步认识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离的关系的重要性,促进台湾史研究的学术繁荣,将有所裨益。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9 月成立,意在推动、组织台湾史的学术研究,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对台湾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发展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国外学者的合作,推动台湾史学科的建设,为祖国统一和学术进步服务。台湾史研究中心成立伊始,我们就设想为台湾史研究建设一个发表成果的园地。鉴于研究台湾历史的学者队伍状况,建立专业的台湾历史学术刊物的条件尚不够成熟。我们改变主张,决定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努力推动台湾史研究,展示台湾史研究成果,使它成为为台湾史研究服务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是一个公开的学术园地。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台湾史研究的成果,以及其他学者所撰写的台湾史专著,愿意交由本丛刊发表者,经本丛刊委托的三名资深专家审定,认为达到出版水平者,本丛刊愿意刊载,公诸同好。本丛刊推出的研究成果,以专著为主,亦包括少量国外研究台湾史的译作。遴选纳入丛刊的著译,力求视点独到、资料翔实、方法科学、论证严密,学术上具有开拓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为本丛刊组织编辑委员会,组成编辑部,并委托专人负责编务。纳入丛刊作品的体例、观点等,皆由作者文责自负。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凤凰出版社担任出版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非赢利、非实体的学术社团,我们将一以贯之倡导、推动台湾历史的研究。我们缺乏经费支持,谨在此呼吁有识之士慷慨解囊,提供出版资金,欢迎国内外各界赞助,以共襄台湾史学科繁荣之盛举。

张海鹏

2010 年 4 月

序 言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土地。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台湾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1918年,台湾爱国志士连横(雅堂)愤于日本统治当局毁弃台湾历史文献,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倾注多年精力,依中国传统史书体例,撰成台湾第一部通史——《台湾通史》。这部书的问世标志着台湾史研究和著述的开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不少学者为配合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纷纷撰写文章介绍台湾历史。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的:第一,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第二,揭露和批判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对台湾的侵略活动,颂扬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其中,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等先生1956年出版的《台湾历史概述》一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发行的第一部台湾历史读物。此后相当长时间,台湾历史研究未能进入历史学者的视线。

1979年以后,随着大陆对台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台湾史研究开始得到重视。1980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建立,这是我国第一所设置于高校的台湾研究专门机构,台湾史研究为其重要任务和特色之一。1981年,该所陈碧笙先生出版《台湾地方史》(自远古至台湾光复),为新时期大陆地区出版的首部台湾历史学术专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多所大学相继建立台湾研究所。其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把研究重点放在1949年后的台湾历史,1988年茅家琦先生主编的《台湾三十年》一书,是大陆地区第一部反映1949年以后台湾历史的书籍。

1996年,在中国史学会和全国台湾研究会推动下,集我国大陆地区主要学者集体力量编纂、陈孔立先生担任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一书出版,此书记载了台湾古代、近代、现代(止于1988年)的历史,是一部比较全面和学术性较强的著作,代表了大陆地区当时的台湾史研究水平。该书对清代以前及清代统治时期的台湾历史叙述较深入,日据时期及其以后的历史叙述则相对显得不足。

在台湾和日本都有一些台湾史著作出版。“两蒋”时代,台湾史研究在台湾被称为“险学”,少有人问津。随着“两蒋”先后谢世,台湾史研究在史学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如今研究台湾史已形成趋势。由于“台独”意识形态的推动,

“险学”变成了“显学”。近20年来,台湾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台湾当局的推动是一个重要原因。1994年台湾“教育部”公布新大学法,调整了课程,在中国史、世界史以外增加了台湾史,加强了师资力量,也加强了支持力度。有人统计,最近十多年,台湾各大学有关史学的硕士、博士论文中,有70%的论文涉及台湾史。20世纪50—80年代,台湾学者研究台湾历史,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大多坚持中国主体性,认为台湾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近20年来,风向发生变化,台湾主体性超过了中国主体性。过去说“荷据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日据台湾”。现在变成“荷领台湾”、“明郑领台湾”、“清领台湾”、“日领台湾”。一字之差,说明了台湾历史研究中基本立场的转变。可以说,以“台独”理念为指导的、脱离中国历史的、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台湾历史研究,在台湾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成气候。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台湾历史研究,正是“两国论”、“一边一国”、“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历史观和文化观上的反应,是“文化台独”走向深入的明显表现。

台湾地区关于台湾历史研究的这一走向也迫切要求大陆方面要有一部材料扎实、观点正确、行文流畅的台湾通史性著作,以便于读者正确、全面地了解台湾的历史。中国大陆学者出版的台湾史著作,对于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来说,还是显得不够。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研究中,台湾史学科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能够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台湾历史的著作甚感缺乏。我们知道,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正在组织学者撰写多卷本的台湾史。他们研究基础雄厚,相对而言,有较强的研究力量。我们期待着,并且祝愿他们早日推出有学术分量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感到有编撰台湾历史的必要。有鉴于此,我们也尝试推动这一研究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是一个晚出的研究机构。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得以成立。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台湾史研究室。台湾史研究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非实体的研究中心,它的任务,是要努力推动中国大陆的台湾史研究。这些年来,尽管十分困难,我们仍然努力聚集人才、培养人才,台湾史研究室略具规模。与此同时,努力增购图书,加强与海内外特别是与台湾的台湾史学者交流。目前,台湾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每人都有两个月或者以上的的时间到台湾访学,搜集史料,扩大眼界。还有几位到日本访问,了解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这些,对于我们年轻的台湾史研究力量提高学术素养,不无裨益。

2005年,我们提出的“台湾历史研究”课题,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课题的评审。我们的研究基础不够,我们努力在学习中、研究实践中提高自己。我们的这项研究,拟分成两项成果,一是两卷本《台湾史稿》,另一是一卷本

《台湾简史》。《台湾史稿》较多从学术角度着眼,《台湾简史》则从学术普及的方面努力。

我们编撰的台湾史,将向如下四个方面努力:

第一,尽可能写成关于台湾历史的平实客观的著作,努力全面反映台湾历史。目前海内外关于台湾历史的论著很多,或者有明显的“台独”史观,或者描述比较肤浅,或者未能概括台湾历史发展的全貌。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论证台湾与祖国大陆发展的密切联系,探讨台湾社会的发展轨迹,我们借鉴已有的学术成果,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台湾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作简明的概括与分析,探讨重大问题的成因,剖析台湾的发展走向。

第二,传播正确的台湾历史知识,正确解释有关台湾历史的观点,使读者了解台湾历史的由来,认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正确理解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的历史依据,这对于在新的世纪里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将有助益。了解台湾的历史,就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驳斥了“台独”谬言。

第三,说明台湾经济起飞的成因。台湾经济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首先在于农业的发展。经过闽粤移民近 200 年的努力耕耘,也经过台湾巡抚的着意经营,台湾从一荒芜之岛发展成为一个农业较为先进的地区。在此基础上,日本人对台湾展开大规模的调查,运用先进的技术,改良品种,建立水电站,进一步推动台湾农业的发展,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1949 年前后,伴随着成百万国民党党政军人败退台湾,大陆数万技术精英来到台湾,依靠美援,以计划式方式,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终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研究西方列强侵略与台湾发展的关系。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成为西方列强侵略染指的目标,荷、西、英、美、法等国都曾侵略台湾,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 50 年。“台独”势力与美、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了破坏中国统一,遏制中国发展,帝国主义惯于打台湾牌,以台制华。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与台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双边关系,在美国的远东战略下形成的美、日、台三角关系成为“台独”势力的温床。我们的台湾史将对美台关系及日台关系的演变轨迹进行历史回顾和客观叙述。

我们的研究集体尚在成长中,我们的研究成果尚很幼稚。为了求得台湾史学科的成长,我们愿意把我们研究台湾历史的心得拿出来,向读者请教。

张海鹏

2010 年 4 月 13 日

目 录

总 序	(001)
序 言	(001)
第一章 早期台湾与台湾的开发	(001)
第一节 台闽史前文化	(001)
第二节 明代以前史籍记载下的台湾	(005)
第三节 台湾的居民	(009)
第四节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与明郑对台湾的经营	(014)
第二章 清代前、中期的台湾府	(021)
第一节 康熙帝统一台湾	(021)
第二节 清初的治台政策	(026)
第三节 移民社会的特性	(032)
第三章 台湾的建省与开发	(042)
第一节 列强入侵与清朝治台政策的转变	(042)
第二节 台湾建省——屏障东南的重要举措	(050)
第四章 台湾割让与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	(066)
第一节 甲午战争与台湾的被迫割让	(066)
第二节 台湾总督府的建立与初期的殖民统治	(070)
第三节 文官总督上任后的殖民统治	(082)
第四节 “七七事变”后中日全面战争对台湾的影响	(087)
第五章 台湾光复与中国政府对台湾主权的重建与运作	(097)
第一节 日据时代的结束与台湾回归祖国	(097)
第二节 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接收与重建	(102)
第三节 “二二八事件”	(107)

第四节	国民政府缓和民怨的措施与台湾的社会矛盾	(113)
第六章	蒋介石的专制统治 台湾经济与社会状况	(120)
第一节	党务改造与历次“全会”	(120)
第二节	“宪政”形式下专制的加强	(127)
第三节	美国对台政策与两次台海危机	(138)
第四节	经济建设和土地改革	(143)
第五节	社会状况	(149)
第七章	蒋经国主政 台湾经济的起飞与社会演变	(152)
第一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的危局	(152)
第二节	蒋经国的两次“政治革新”	(160)
第三节	台湾经济的发展	(179)
第四节	台湾社会的演变	(187)
第八章	“台独”势力形成与台湾社会情势	(194)
第一节	战后“台独”势力的缘起	(194)
第二节	李登辉时代台湾政治发展与变化	(197)
第三节	两岸关系与李登辉的主张	(207)
第四节	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及其政治策略	(216)
第九章	两岸经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220)
第一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及其对台湾的影响	(220)
第二节	两岸经贸关系	(222)
第三节	两岸交流领域的扩大	(236)
第四节	从僵持到和缓的两岸关系	(243)
第十章	台湾的文化与教育	(253)
第一节	早期文化与教育	(253)
第二节	清代台湾文化与教育	(256)
第三节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教育与文化	(263)
第四节	光复后的台湾教育与文化	(274)
后 记		(281)

第一章 早期台湾与台湾的开发

第一节 台闽史前文化

台湾与福建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即发生非常密切的联系。现今在福建发掘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举其重要者有四处:其一是距今约 20 万年前的三明万寿岩遗址,其二是距今约 4—8 万年前的漳州莲花池山遗址,其三是距今约 2—3 万年前的长汀风雨亭遗址,其四是距今约 1 万年前的惠安西面山遗址。台湾的旧石器时代为何与福建有关?则必须从史前时代台闽的地貌说起。在远古时代,因为历经造山运动与冰河的关系,台湾与大陆曾几次相连与分离。如此的发展,尤以距今 180 万年前的第四纪最为关键。

第四纪中台湾海峡的演变,可以划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期称为鄱阳冰期,距今为 150 万年。当时海面下降约为 60 米,台湾海峡成为陆地,剑齿象、犀牛、大角鹿等动物,纷纷从大陆迁移过来。这些动物的化石,也陆续在台湾的台南与台中被发现。不过到了晚季,因为气候回暖,冰雪消融,海面回升,台湾又与大陆分离;第二期称为大姑冰期,距今为 120 万年前;第三期称为庐山冰期,距今为 32 万年前;第四期称为大理冰期,距今为 11 万年前。这三期台湾与大陆的分合,如同第一期之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期——大理冰期的发展,因为福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极可能就是在这一期迁往台湾的。至于他们迁徙的路线,根据福建沿海考古挖掘的结果,猜测以“东山陆桥”为管道,从福建南部的东山,进入台湾的南部。另外,台湾与大陆相连在一起,台湾的东海岸就成为古大陆的海岸。如果史前人类想要迁徙至海边,必定要往台湾移动才行。这些推论在台湾陆续被发掘的史前遗址上,逐步得到证实。

台湾迄今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总共有三处:一是台东长滨文化,二是台南的左镇人,三是苗栗网形文化。1968 年由台湾大学教授宋文熏、林朝棨共同发掘的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遗址,是台湾光复后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世界知名的考古学者李济,特别将这处遗址命名为“长滨文化”。1971 年宋文熏又前往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探察当地发现的犀牛化石。无意间在民间收藏家住处,发现史

前人类头骨残片。此后该地区陆续有牙齿与人骨的出土，因此按地区命名为“左镇人”。1989年台湾考古学者刘益昌，特别将他在苗栗县大湖乡网形发现到的石器，视为台湾中、北部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文化，以有别于长滨文化所分布的台湾东部，以及恒春半岛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根据测定长滨文化距今有5万年之久，网形文化也约有4.5万年的时间，左镇人可能在距今2—3万年左右。有趣的是，从地缘关系来看，台湾旧石器时代的史前人类，应该源自于福建。但是今天的研究成果显示，网形文化石器的类型，跟广西新州地区出土石器相似。长滨文化石器的类型，则与贵州兴义县猫猫洞文化相似。可见包括台闽在内，都属于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一环。

长滨文化持续的时间很长，甚至于进入新石器时代初期仍在发展。可是同一时期，在台湾西部海岸出现一个重要的文化，称为“大坌坑文化”。该遗址是1964年由世界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在台北县八里乡发掘，距今时间约在6500年至4600年。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磨制与打制的石器、绳纹陶器、陶纺轮。虽然大坌坑文化分布地区很广，如台南、高雄、澎湖，甚至于宜兰、花莲、台东。但是现今台湾考古学界都认为，大坌坑文化不是从长滨文化发展而来。它应该是台湾成为海岛以后，从岛外移入的新文化。然而究竟是从何处移入？福建沿海同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它们是距今约8000年前的金门县金湖镇富国墩遗址，以及距今约5500年前的平潭岛壳丘头遗址。这是因为出土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绳纹陶。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台湾考古学界对于各处遗址年代的分期，看法没有形成共识。如果以刘益昌的看法为例，当时台湾的史前文化应分成四处——北部的讯塘埔文化、中部的牛骂头文化、南部的牛稠子文化、东部的绳纹红陶文化。它们的年代，大约距今4600年至3500年前；并且在历史发展上，都与大坌坑文化有继承关系。

讯塘埔在台北县八里乡，出土的文物总计有：红色或褐色夹砂绳纹陶、红色夹砂素面陶、打制的石斧、磨光的石刀等。牛骂头在台中县清水镇，出土的文物与前者相仿，但是有大量的石制农具被发现，证明已进入农耕的阶段。牛稠子在台南县仁德乡，出土的文物中最重要的是稻米，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台湾也有水稻栽培的技术。另外石器的材质也非常特殊，多是澎湖才有出产的橄榄石与玄武岩，直接说明二地来往的证据。特别是在牛稠子遗址中，也发掘到几处墓葬，都是采用直肢式葬法。至于东部所发现的文化遗址，还未命名，目前暂称“绳纹红陶文化”，而且推测这个史前文化的传播路线，很可能是从台湾西南沿海传往东部。

承袭上个阶段台闽史前文化交流的结果,新石器时代中期福建与台湾相对应的文化,即是闽侯县昙石山、庄边山、白沙溪头遗址,以及福清东张遗址。特别是以闽侯县石山遗址为代表的“昙石山文化”,已经被认定是福建古文化的摇篮。现今只开挖三分之一的面积而已,若全面挖掘的话,估计其规模将超过陕西半坡与浙江河姆渡遗址。

步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台湾各地发现的遗址更多,它们包括:北部的圆山、植物园、芝山岩文化;中部的营埔、大马璘文化;南部的大湖、响林、凤鼻头文化;东部的丸山、花冈山、麒麟、卑南文化。它们的年代,大约距今3500年至1800年前。然而在历史发展上,有些文化不一定与新石器时代中期有继承关系。

北部的三处文化,都在台北市被发现。史前时代的台北盆地,因为地层下陷与海水涌入之故,曾经形成“古台北湖”。当时的史前人类,就定居在湖畔或岛中。圆山文化遗址在台北市中山区,史前时代的圆山可能就是湖中的小岛或半岛。在该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最特别的是“贝冢”的发现。所谓的贝冢,就是史前人类的垃圾堆。而从贝冢中更发现,最多的竟是食用过的螺壳与贝壳,其次才是兽骨。另外肩石斧的发现也很特殊,这是把扁平矩形的石头两侧打凹,以便于用绳子系紧在木棒上。从出土陶器的研究来看,它跟讯塘埔与大坵坑文化有关。植物园文化遗址在台北市中正区,它与圆山文化有继承关系。然而发现到的石器,属于渔猎器具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农具;并且出土陶器的纹饰,很类似同时期大陆沿海发现的几何陶文化。芝山岩文化遗址在台北市士林区,在史前时代此处是一个小岛。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座墓葬、碳化的稻米、石器与陶器。可是它的文化类型与圆山文化存有差异,迄今还找不出源起。

中部的两处文化,营埔文化遗址在台中县大肚乡,它跟牛骂头文化有继承关系。不过陶器的颜色以灰黑色居多,红褐色次之,因此也有学者称它为“黑陶文化”。最特别的是出土的陶器,发现到一块印在陶器表层里的稻谷痕迹。大马璘文化遗址在南投县埔里镇,颇为有趣的是,它是首座被发现在崇山峻岭中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因此文化类型在黑陶的部分,受到营埔文化的影响;可是在玉器与岩板石棺的部分,发现受到东部卑南文化的影响。

南部的三处文化,大湖文化遗址在高雄县湖内乡,它跟牛稠子文化有继承关系。出土的陶器,也是以黑陶为主。至于石器的材质,不少源自于中央山脉的板岩。证实先民活动的范围,有向东侧山地扩大的趋势。响林文化遗址在屏东县满州乡,该乡的位置已面对太平洋,从地缘上看应该被划为东部史前文化遗址才对。不过遗址的地点接近内陆,而且史前文化的传播方向,可能还往更内陆的中央山脉南段发展,所以仍划为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出土的陶器以素面红陶居多,文化类型自成一格。凤鼻头文化遗址在高雄县林园乡,出土的陶

器以彩陶为主，在文化类型上也是自成一格。

东部的四处文化，丸山文化遗址在宜兰县冬山乡。出土的陶器以褐色与灰色居多，并且有石板棺、瓮棺、玉玦、玉环的发现。在文化类型上与圆山文化与卑南、花冈山文化有互动关系。花冈山文化遗址在花莲市，出土的陶器以彩陶、绳纹陶、瓮棺为主。麒麟文化遗址在台东县成功镇，出土文物最特别之处，则是发现了许多巨石，故又被称为“巨石文化”。其巨石的现象，不见于台湾与大陆东南其他史前遗址，反而跟中南半岛的巨石文化类似，实为两地来往的证据。卑南文化遗址在台东市，出土文物最特别的是有许多石板棺与石柱。同时也挖掘到殉葬用的玉玦、玉管。由于墓葬中也有不少无头的遗骸，推测应是聚落发生战争时的牺牲者。根据研究，花冈山、麒麟、卑南文化，应都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东部绳纹红陶有继承关系。

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福建所发现的遗址有漳州市芗城区覆船山，以及东山县陈城乡大帽山。前者出土的陶器，纹饰不少为方格纹，在文化类型上与台北植物园文化有关。后者出土的陶器有一种黑灰色陶，在作法上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有相似之处，但在型式上与高雄大湖文化黑陶有关。不过需要知道的是台闽在当时的发展下，已经走到历史分叉的路口。原因是距今3 500年前，华北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并且已发明文字。如此的发展，历经夏、商、周、秦、汉版图的扩大，使得福建最迟在3 000年前也进入金属器时代。现今在福建发现到的几处重要遗址，包括南安大盈出土的青铜兵器、建瓯小桥阳泽村出土的铜钟，以及在武平、光泽洋塘、崇安兴田、长汀河田、云霄尖子山出土的青铜器残片等，说明了它们的文化发展，都与台湾金属器时代的历史无关。

金属器时代的台湾，大约距今1 800年前。现今所发现到的代表性文化，包括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中部的番仔园与大邱园文化，南部的茑松、北叶与龟山文化，东部的静浦文化。在文化的延续上，除了龟山文化可能是偶发性的外来移民之外，其余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有文化延续性的关系。

北部十三行文化遗址在台北县八里乡，它是台湾最重要的一处金属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非常丰富，总计有红陶、少量的石器与骨角器，以及一座炼铁炉。炼铁炉的发现，证明先人已懂得炼铁的技术，而矿石的来源是取自邻近观音山的安山岩。不过学者也推测，当时的炼铁技术，应该得自于汉人的传授。由此可知十三行文化发展，背后的海洋贸易功不可没。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有大量青铜器、瓷器与琉璃珠的发现，因为它们都非在台湾出产制造。青铜器的种类有箭簇、铃铛、容器、钱币、刀柄与鍍金铜碗。在出土的90余枚钱币中，只有一枚是六朝时代的，其余以唐、宋居多。很显然它们都是交易得来，不过十三行的先人拿了这些钱币，则是穿孔当作衣着装饰品之用。至于出土的

11 件青铜刀柄,都是站立的人形图案。同属于金属器时代的越南东山文化,也有出土青铜刀柄的记录,可是台湾与越南的样式不符。因此这些刀柄,有可能来自于大陆东南沿海。至于鍍金铜碗,属于唐朝花纹的风格,只出土一件,异常珍贵。

中部的两处文化,番仔园文化遗址在台中县大甲镇,出土的重要文物有铁刀、玻璃与玛瑙珠。然而它的墓葬形式,却与十三行文化有明显差异。番仔园的先人采用俯身直肢葬法,十三行的先人采用侧身屈肢葬法。大邱园文化遗址在南投县集集镇,虽然迄今仍未发现到金属器文物,但是出土的琉璃管、琉璃珠与十三行文化相仿,不排除两地交流的可能。

南部的三处文化,葛松文化遗址在台南县永康市,有少量铁器出土。北叶文化在屏东县玛家乡,不过该遗址没有金属器的出土。龟山文化遗址在屏东县车城乡,出土有铁刀与铜环。出土的陶器的纹饰,除了几何纹、刺点纹之外,还首次发现人形纹,这是迄今台湾各史前遗址中所没有的。

东部静浦文化遗址在花莲县丰滨乡,出土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铁器、玻璃、瓷器、玛瑙与金饰。

从上述的史前遗址来看,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台湾并非一座孤岛。在不同的阶段,岛上的史前人类除了彼此进行交流之外,更以舟楫来往于福建或其他地方。出土的文物还显示,岛上的先人必须要借助于汉人的造访,才有使用金属器的机会。因此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再对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台湾早期的历史,从浑沌中逐渐得到厘清。

第二节 明代以前史籍记载下的台湾

台湾作为地名,直到明末清初才见于记载。明末(1635 年)何楷上《靖海疏》,提到台湾。清初(1667 年)施琅上《边患宜靖疏》,也提到“盖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1683 年清廷设立台湾府之后,台湾作为地名并且指称台湾全岛就固定下来了。台湾在清代以前尚有许多名称。清代编修台湾府志时,认为“台湾”一词最早出现在文献上,可从《尚书·禹贡》追溯起,并且认为属于“扬州”之域。《台湾府志》还引述《列子》、《山海经》、《史记》、《汉书》的说法。上述这些古籍中都提到东海的几座岛屿,例如:方壶、岱舆、员峤、雕题、瀛洲、东鯤,《台湾府志》的编纂者推测,这些不同的地名,指的都是台湾。不过多数台湾史学者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很显然,当时古人受限于海洋知识的不足,并不了解在太平洋西侧与大陆之间,其实是有一串岛链分布着。对台湾地理位置的认识,在三国以后有了重大的改变。

从历朝的文献看,公元3世纪末西晋时人陈寿所编《三国志》,可说是与台湾相关的首部正史。书中提到吴黄龙二年(230),孙权命令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找寻夷洲与亶洲。亶洲原来是秦始皇派遣徐福下海求仙药一去不返的地方。亶洲毕竟距离太远,孙吴的军队只到达夷洲,就掠数千人而还。对于《三国志》的描述,今天如何认识?亶洲其实就是中国古籍中的日本,在三国以前中日早有航线往来。当时中国前往日本,必定要从朝鲜半岛出发,再抵达本州岛西部或九州岛北部。可是步入三国时代,中日航线已经被曹魏所控制。如果孙权要与日本往来,势必要开辟新航线才可以。

孙吴的船队到达夷洲的过程中,有一位从军的随员名叫沈莹。他把抵达夷洲之后的所见所闻,记录在《临海水土异物志》上。书中有七处重点值得注意:第一,男人皆削发穿耳,但女人不穿耳。第二,当地人懂得纺织,能够织出斑纹布。第三,当地亦出铜铁,但是战斗时不用金属制武器,只用鹿角矛作战;此外用磨制的石器,做出箭簇、刃斧。第四,喜食生鱼肉,并且懂得酿酒、饮酒。第五,有馘首的习俗,而且把砍得的头颅,依次挂在中庭架上,以彰其功。第六,住家居室建于栈格上。第七,父母死后的葬法,先杀犬祭之,再把尸首放入四方容器中。饮酒歌舞完毕后,将容器悬于高山岩石间,不埋在土中作冢。

从以上几点细究,第一、二、三、四、五、六点,不管从史前考古遗址,还是台湾少数民族留有的旧俗,都可以判断沈莹一行应该是来过台湾。可是第七点恐怕还需考证。第七点所列丧葬习俗,这种葬法现今称为“悬棺”。如此丧葬方式,不管从台湾少数民族的旧俗,或者史前考古的遗址,都还找不到类似的记录。清初记录南部平埔族的丧葬方式,的确有使用棺槨的习俗。但是他们最后会把棺槨埋入土中,而非使用悬棺葬法。总之,《临海水土志》所见台湾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绝大部分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事实上,孙吴的大军来到夷洲后,因为与开辟新航线的目的不合,亦无久据当地的计划。因此就有如三国时代,战胜者视人口为重要的劳动力,往往在作战胜利后就强迫人民迁徙,也带回夷洲百姓数千而还。不过这一次的行动,仅算是昙花一现的海外探险。

据唐初纂修的正史《隋书》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朱宽一行来到流求国,因为言语不通,只掠一人而返。这一次成果,却让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激发了海外探险的兴趣。次年隋炀帝再派朱宽前往流求国招抚,但是流求人从不从,于是朱宽取其布甲而返。隋炀帝决心进讨流求国,遂于大业六年(610)年命令武贲将军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率领甲士万余人,从广东潮州出海。船只航行月余,才抵达目的地。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是商旅,遂前去贸易。陈棱先遣军中懂得流求国语言的人招谕,然而流求人还是拒绝臣服。于是陈棱派遣张镇周为先锋,即刻展开攻击。史载这场军事

行动极为顺利,除了阵斩土酋之外,还攻破其国,并掠男女数千人而还。

由于唐初纂修《隋书》的时间距离炀帝派遣军队征讨流求国仅仅三十年,所以书中所提到的内容,应该都是可信的。只是流求国是否为台湾?这个历史考证从日据时期以来,学术界看法很分歧,多数学者认定是台湾。现不妨从中国海洋史的角度,以两个层面加以讨论:

其一,航海技术的发展。隋代的航海技术,继承六朝而益趋发达。当时的水手,对于制作不同结构的风帆,以及御风的技术都已成熟。而从西沙群岛出土的六朝瓷器来看,可证明当时中国的远洋船只,不需要沿着海岸线航行照样可以走远。因此,隋代朱宽与陈棱、张镇周一行,若想驾船穿越台湾海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其二,流求国到底是今天的台湾,还是日本的冲绳?从朱宽两次抵达流求国的描述来看,当时船只对于前往流求国的航线,应该有所记录。其实《隋书》对于流求国的“距离”,亦有所描述,称它在福建福州的东方,水行五日可至。不过既然五日可至,为何陈棱需要航行月余方能抵达?推断他们一行,出发之后因风受阻,可能又被吹回闽粤附近的港口,几经折腾,最后花费月余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然而正史著述的笔法要求简洁,不可能详细记录所有过程,因此只记下结果。最值得注意的是,陈棱还带了“翻译”前往,可见对于流求国当有所熟悉。所以朱宽、陈棱、张镇周抵达的流求国,应该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事实上这篇文献所载,要确定是否为台湾的关键,就是人名翻译。书中称他为“昆仑人”,若按隋唐时期的用法,昆仑人指的就是来自中南半岛、南洋诸岛的人(唐代传奇亦有昆仑奴的故事)。可见《隋书》记载的昆仑人,要不是本身就是南岛民族,或者就是也懂得南岛民族语言的人。因此,他随军从征流求国,可以用南岛民族的语言充当翻译。而台湾的原住民属于南岛民族的一支,今天冲绳的琉球人却不属于南岛民族。可见朱宽、陈棱、张镇周抵达的流求国,就是台湾。

隋炀帝并没有在流求国设官统治的计划。当战事胜利后,也把流求住民当作俘虏,强迫迁徙带回大陆。八年之后隋代就灭亡,继起的唐代没有经营流求的想法,所以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找不到关于台湾的记录。不过有理由相信,整个唐代在大陆东南海域航行的水手,对于台湾这座岛屿,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原因有二:一是公元8世纪中叶,中国的水手终于开辟出从浙江的港口出发,直接穿越东海,先抵达九州岛以南的奄美大岛,后抵达九州岛南部的中日航线。由于奄美大岛离冲绳不远,应有助于让当时的水手了解,今天的冲绳与台湾是不一样方位的岛屿。其二:唐代四大港——江苏扬州、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的兴起,这些船只来往于台湾海峡,多少会望见一水之隔的台湾。这些有利的条件,果然带给下一个阶段中国海洋史发展新的契机。